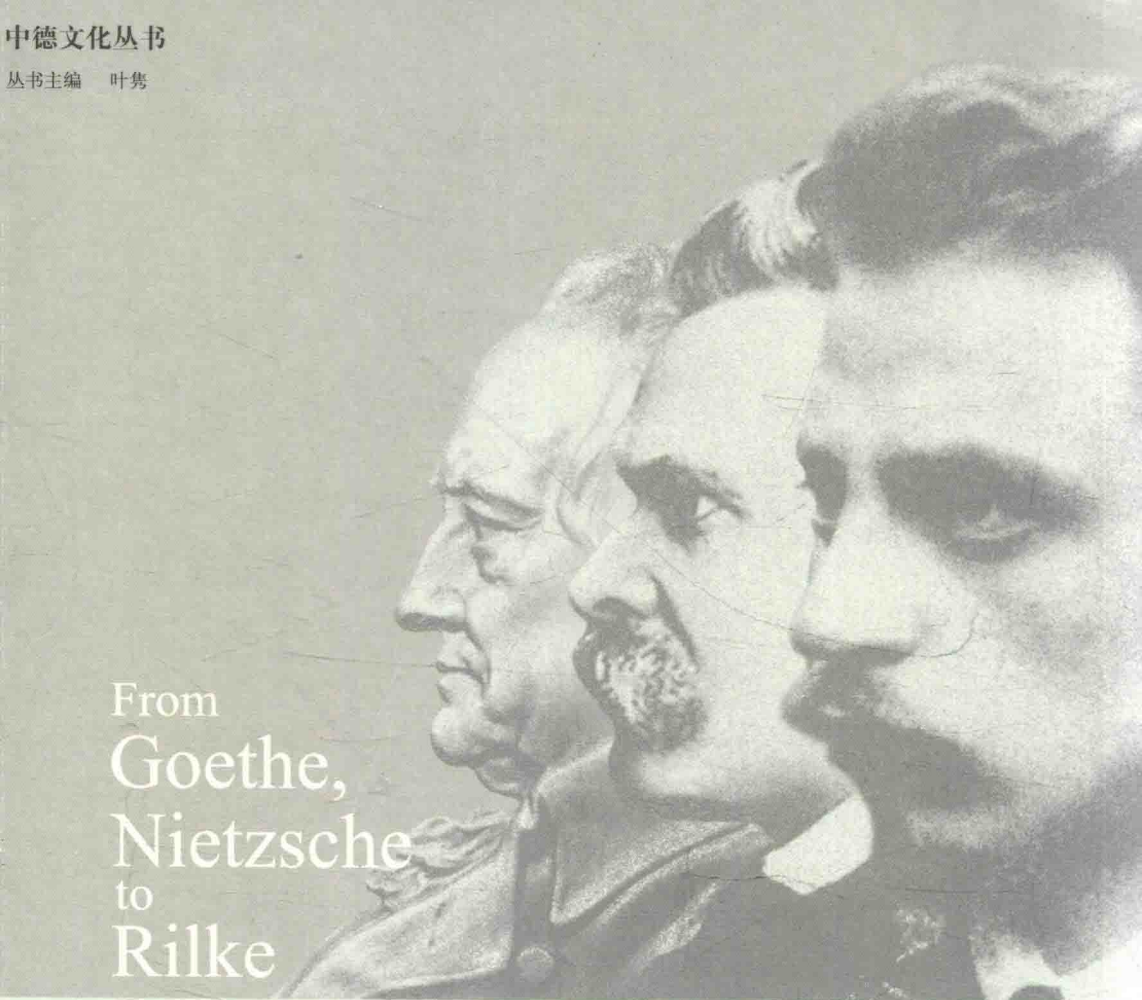


中德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叶隽



From
Goethe,
Nietzsche
to
Rilke

Studies In Sino-German Interliterary Process

[斯洛伐克] 马立安·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 著

本书主编 / 刘燕

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
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中德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叶隽

From
Goethe,
Nietzsche
to
Rilke

Studies In Sino-German Interliterary Process

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
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

[斯洛伐克] 马立安·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 著

本书主编 / 刘燕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 /
(斯洛伐)高利克著；刘燕主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34-7189-7

I. ①从… II. ①高… ②刘… III. ①中德关系—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G125 ②G1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7977 号

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
高利克 著 刘燕 主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25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4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189-7

定价 59.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
陈洪捷 北京大学
范捷平 浙江大学
李明辉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麦劲生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孙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
孙周兴 同济大学
卫茂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武能 四川大学
叶隼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国刚 清华大学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Adrian Hsia 夏瑞春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Françoise Kreissler 何弗兹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
Iwo Amelung 阿梅龙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Joël Thoraval 杜瑞乐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Klaus Mühlhahn 余凯思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Michael Lackner 郎密榭 德国埃尔朗根大学

“中德文化丛书”总序

叶隽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

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并由此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较快前进，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文化因其所处地理中心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中德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

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域（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不仅是中國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

更投入到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古代中国”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

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画地为牢，因为只有将视域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19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

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了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体例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鲜活的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各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 自序 ·

我的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之历程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几年，我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不过此前几年，我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读书时，我从一个“苏联书店”购买了一本《歌德选集》(*Ausgewählte Werke*)，共 729 页，于 1949 年莫斯科出版。在高中的最后几年里，我陆陆续续地读了一些，至今还能背诵几段他早期的诗——如《五月之歌》(*Mailied*)，据说诗人写于 1771 年，后由英国 John Sigerson 译成英文“May Day Celebration”：

O maiden, maiden
How I love thee!
Your eye's a-sparkle—
How you love me!

O Mädchen, Mädchen,
Wie lieb'ich dich!
Wie blickt dein Auge!
Wie liebst du mich!

啊，少女；啊，少女，
我多么爱你！
你的眼若流波，
你多么爱我！（张威廉译）

1960年我从中国留学返回故乡，遇见了诗中所唱的“少女”，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结为夫妻，直至2001年她离我而去。1968年苏联率领华约军队入侵斯洛伐克之后，人们很难突破其封锁而获取新书。在此之前的五六十年代，苏联出版的图书是我们眺望世界的唯一窗口。我对歌德倍感兴趣，这本选集成为我忠实的伙伴。它收录了歌德不同风格的诗作、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悲剧《埃格蒙特》（*Egmont*）以及《浮士德》（*Faust*）上下部。我年轻时爱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而阅读《浮士德》十分困难，多年未解其味。

一、“歌德与中国”研究

1961-1986年我无法去中国，不过，1960-1988年间我有一段时间可以离开斯洛伐克，从事某些课题的研究。1967年，我受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的资助，赴慕尼黑学习一年。1973年我又去了德国，有幸进入波茨坦（Potsdam）中心档案馆，我查询到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会的相关资料，其中记录了中国各地的庆典盛况，而在中国却很难找到这些宝贵的资料。之后不久，即1976年在德国魏玛（Weimar）举办了第三届亚非文学理论问题国际研讨会（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Asian and African Literatures），我宣读的英语论文《歌德在中国（1932）》（*Goethe in China* 【1932】）^[1]得到了一些欧洲学者的肯定，后来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认可，如著名歌德研究学者杨武能大段引用，见其论著《歌德与中国》（1991，p.121-124）。这是我有关歌德研究的第一份捷报。此后林振华将这篇英语论文译成中文《1932年：歌德在中国的接受与纪念活动》（发

[1] Marián Gólik: *Goethe in China (1932)*,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Bratislava), Vol.14, 1978, pp.11-25.

表在《长江学术》2015年第4期)并收录本书中。1932年3月22日,是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中国也不例外,相关记录资料至今保存在德国。由巴金编撰、南京钟山书局出版的《歌德之认识》(1933)一书带我领略了当时的盛况——1932年3月22日前后,中国发生了什么?人们如何看待这位德国伟人?这次庆典活动的高潮是在北京举行,典礼于夜间9点开幕。但当晚天空出现了月偏食,一些迷信的中国人不愿出门参加庆典,而出席者却视之为上天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哀悼。这次庆典活动在北京德国公馆举行,有250人出席,梅兰芳(1894-1961)、袁同礼(1895-1965)和张君勱(1887-1969)等列坐其中。在广州,活动主办方向中外来宾赞扬了浮士德精神。浮士德不屈不挠的反叛精神(就如中国人民抗日一样),以及对完满的无限渴望、对成功的强烈愿望,对战时的中国人有着非凡的启迪意义。当日,天津出版了《葛德纪念特刊》(*Dem Andenken Goethes*,“葛德”即“歌德”,这是当时该报使用的翻译——译者注),刊登了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贺麟(1902-1992)、唐君毅(1909-1978)、宗白华(1897-1986)等人的文章。这些杰出的中国学者为歌德逝世100周年庆典所作的贡献,一直不为人知,直至我的《歌德在中国(1932)》一文发表后才逐渐浮出水面。

也许是这篇论文引起了夏瑞春教授(Adrian Hsia, 1938-2010)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博教授(Günther Debon, 1921-2005)的注意,他们发起了“欧洲-中国”(Euro-sinica)的系列研究,并组织了几次研讨会。我曾受邀参加,但因政治原因未能成行。不过其中的一次会议收录了我提交的德语论文 *Rezeption und Wirkung von Goethe's Faust in China: Der Fall Guo Moruo(1919-1947)* (《歌德〈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1919-1947)》)。^[1] 这篇论文目前没有中文译本,无法收入本书。如果读者有兴趣,

[1] Marián Gólik: op.cit., *Zur Rezeption von Goethe's Faust in Ostasien (On Reception of Goethe's Faust in East Asia)*, Ed. Adrian Hsia. Bern: Peter Lang, 1993, pp.183-195.

可翻阅本书中的另一篇论文《歌德〈浮士德〉在郭沫若写作与翻译中的接受与复兴》^[1]，不过这篇文章中只谈论了1919—1922年的情况。

在写《青年张闻天和他的“歌德的〈浮士德〉”》时，我埋首书海近20年，收集了张闻天先生写作《歌德的〈浮士德〉》时援引的文卷。张闻天写作《歌德的〈浮士德〉》时年仅22岁，中国学术界一直视之为张闻天的独创之作。但事实并非如此。张闻天的论文观点大部分源自一本书《浮士德神话与歌德的〈浮士德〉》（*The Faust Legend and Goethe's Faust*），此书1912年由伦敦George G. Harrap & Company出版社出版，现存于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作者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科塔利尔（H.B. Cotterill）。当时，张闻天可能经由好友茅盾介绍，从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库里读到了这本书。在此我万分感谢傅熊（Bernard Führer）教授，以及斯洛伐克东方与非洲研究所，为我提供了这本珍贵著作的缩影胶片。

我的另一篇论文《冯至及其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于1997年发表（中译文由刘燕教授翻译发表在《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当时正值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奥德里奇（A. Owen Aldridge, 1915—2005）八十寿诞，要出版其纪念文集，于是我交付了这篇论文。我解读了一首冯至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和一首歌德的诗作《幸福的憧憬》（*Spiritual Yearning*）。若说郭沫若创造的是诗意的“太阳”宇宙，那么冯至与他截然不同——创造的是“星空”宇宙，其中每一颗星都如同微小尘埃。台湾学者纪秋郎评论“此文可视为文化历史写作的榜样。”（参见《淡江评论》2001年第1期第274页）。

1994年我完成了一篇论文《冯至和歌德的〈浮士德〉——从靡非斯托非勒斯到海伦》，但由于当时无法公开的原因，该文不是以英文发表。杨治宜教授（目前在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工作）的中译文十分贴切，发

[1] 原文题目：“Reception and Survival of Goethe's *Faust* in Guo Moruo's Work and Translations, 1919-1922”.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Bratislava), Vol. 26, 1991, pp. 49-70.

表时恰逢冯至诞辰 100 周年（2005）庆典。我在撰写此文时，仔细研读了冯至的《〈浮士德〉里的魔》（1943）和《〈浮士德〉海伦娜悲剧分析》（1979）两篇论文之后才动笔。^[1] 这两篇论文分别于抗日战争结束前两年和文革结束后三年完成。在这段相距久远的时间内，冯至对歌德的研究逐渐深入。我曾两度与冯至会面，一次是在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另一次是在他家里。在他家中相聚时，我有幸参观了他的书房，还复印了几本书。其藏书中有一些便宜的德文小册子，应该是他在德国做穷学生时购买。从 1935 年回国到文革结束的日子里，冯至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和恒心研究歌德。也许是我不够细心，我并没有发现他在逝世前几年有任何优秀之作。1941 年在昆明，冯至写下了《〈浮士德〉里的魔》，文中他不赞成将靡非斯托非勒斯（Mephistopheles，有的中译为“靡菲斯特”）完全视为“恶魔”。他没有声讨靡非斯托非勒斯，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恶魔，而“是那力量的一部分 / 它永远愿望恶而永远创造了善。”在海德堡求学期间，冯至承其师海因里希·李科特（Heinrich Rickert）之志，追求爱与美。要等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8 年他才开始逐渐欣赏《浮士德》第二部中的海伦娜（即海伦 Helen），把她视为浮士德的知己，并写下了《〈浮士德〉海伦娜悲剧分析》。歌德本欲按照《浮士德》最后几行诗句书写，将海伦娜归为“永恒女性”系列，但是在当时传统观点和基督教教条中，海伦娜只能属于有限的肉体凡胎，他不敢把她纳入其中。

1992 年 4 月 25 日，顾城和我在柏林见面，《〈浮士德〉、〈红楼梦〉与女儿性》是我俩的谈话记录。此天前，德国波恩举办了“《红楼梦》研讨会”，主持人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顾城没有参加会议，但是对研讨内容很感兴趣，我们见面时他侃侃说起了《红楼梦》。于是我顺势把歌德的《浮士德》与《红楼梦》进行了比较。这个题目恰如其分，因为顾城很喜欢读这两本书。顾城当时已出现了某种精神分裂症状，自比

[1] 参见冯至：《论歌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 3-23 页及第 91-115 页。

为贾宝玉（与我谈话时就是如此）。当时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两部作品中的“女子性”。我认为“女子性”类似歌德笔下的“永恒女性”（das Ewig-Weibliche/Eternal Feminine），但顾城认为“女子性”应为“女儿性”，是“永恒女孩性”（Eternal Maidenly）。当然，这是顾城对歌德的某种误读。不过“女儿性”更好地解释了顾城对待女性，尤其是所钟爱的年轻少女的原因，以及他为何欣赏《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尤其是宝玉身边得宠的丫鬟晴雯——她让他想起曾经的恋人英儿。顾城读的是郭沫若的《浮士德》译本，他当着我的面，背诵了该译本的最后几行——《神秘的合唱》（Chorus Mysticus）：

一切无常者，
只是一虚影；
不可企及者，
在此事已成；
不可名状者，
在此已实有；
永恒之女性，
引导我们走。

这短短八行诗句让顾城琢磨不透。除了郭沫若的译本外，我还找到了其他五个译本，译者分别是张闻天、周学普（1900-1983）、董问樵（1909-1993）、钱春绮（1921-2010）以及绿原（1922-2009）。2011年我发表的英语论文《歌德〈神秘的合唱〉在中国的译介与评论》，研究的对象就是这几个不同的中译本。在柏林见过顾城和他夫人谢烨后，我开始思考歌德的“永恒女性”的问题。1998年9月28日至10月2日，波恩举办了第27届德国东方学大会，在会上我试着分析了20世纪中国著名翻译家有关 *Chorus Mysticus* 诗行的翻译情况。我以为这八行诗描述的是

惟有女性才能引导我们上升到大爱，如圣母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埃及的马利亚和浮士德逝去的恋人甘泪卿——她们全都在《浮士德》第二部出场。虽然顾城可能不太同意我的想法，但那次谈话时，他提到了但丁《神曲》的最后一句诗，并将这句诗与“爱，让星球转动”呼应，以此结束了我有关“女儿性”的讨论。的确，但丁游览天堂后自白道：“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谈话前，顾城刚好读了《神曲》的中译本，那是他从冯铁（Raoul D. Findeidsen）那儿借阅的。在论文《歌德〈神秘的合唱〉在中国的译介与评论》中，我将已有的六个中译本与贝阿德·泰勒（Bayard Taylor）（1825-1878）的著名英译本做了对比，还列举了中国读者尚未熟悉的德国批评家 H. Jantz 和 A. Schöne 的评论和批评文章。我建议今后中国译者在翻译世界名著时，应多多关注或参考国外优秀学者的相关成果。

最后一篇关于歌德的论文是为第二届“郭沫若文献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IGMA (International Guo Moruo Academy) 学术年会”而写，这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1-22 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该文的中译版《歌德〈浮士德〉中的哥特式房间和日本箱崎的一间陋室》发表于《世界汉学》（2011 年第 8 卷第 110-117 页）。90 年代初，乐黛云教授送了我一份《浮士德》第一部《夜》的手稿副本，它是民国时期的中译稿，发表于民国八年双节（1919 年 10 月 10 日）《时事新报》第 5 页“学灯”专栏。因此我十分感谢乐黛云教授的赠书。郭沫若曾说翻译《浮士德》时，参考的德文版是德国莱克拉姆 (Reclam) 出版社的版本（但未提年份），同时也参考了 John Auster 的英译本（也未说明是 1835 年版还是 1875 年版）。乐黛云教授赠与的手稿副本，与郭沫若 1928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浮士德》译本第一部分内容有所差别。这一段时期，郭沫若郁郁寡欢，婚姻不顺，因此对《浮士德》的理解和翻译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